

中文摘要

天主教于鸦片战争前在东北地区就有传播，基督教则在 1852 年进入东北。本文以东北地方史志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考察了 1912 年前天主教、基督教在东北地区传播的状况，试图对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进行探讨。

全文分三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介绍了清末洋教传入东北的情况。西方传教士借助条约特权的保护打开了在东北传教的通道，营口开港对洋教在东北传入产生了重要影响。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列强向内地渗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教堂早期多分布在地方沿海中心、经济中心以及交通线附近。天主教相对于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侧重于内地，深入农村。

第二部分，阐述了清末洋教在东北的活动。天主教与基督教为了扫除传教的障碍，兴办了大量的社会事业，包括医疗、教育、社会改良、慈幼等。由于自身的特点，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地区采取了不同的传教方式，在社会事业方面的侧重点不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基督教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教育事业方面，天主教侧重于神学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小学教育，基督教在高等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成绩突出。天主教传教士要比基督教传教士更注重开设教会的慈幼事业，社会改良及救济事业则是基督教的热心所在。

第三部分，分析了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造就了一群信仰与传统不同的民众，使得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复杂化，并引起了相互的冲突。传教士开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加速了东北近代化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当一部分传教士是作为列强的侵略势力而来到中国的。这部分传教士倚仗传教特权势力在中国作威作福，勒索教案赔款，霸占田产，强取豪夺，欺压官民，与洋教传入的积极作用相比，其消极作用同样明显。

关键词：清末；东北；天主教；基督教

Abstract

Before the Opium War, the Catholic Church had spread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Christianity entered into the Northeast in 1852. Based on the history records of the Northeast and the history cultural heritage datum, this dissertation inspects the situation of Catholic and Christianity introduced to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tries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western religions introduction on the Northeast community.

The 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western religion introduction to the Northeast region. Western missionaries opened the door of propagandism depending on the treaty. Yingkou opens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western religions introduction. The Catholic and Christianity grew in western powers' penetration to backland, the most churches lied in the coastal areas and the economic centers, or nearby the transit lines. The Catholic missionaries focused more attention than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on the mainland and rural areas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The second part expoundes western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the Northeast in Late Qing. To remove the obstacles, the Catholic and Christian missionaries esta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social services which included health, education, social reformation, philanthropy, etc. Because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Catholic and Christian missionaries took different means, their emphasis is different in social undertakings. The Christianity had mad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medic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In the aspect of educate, the Catholicism lay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theology educate and the primary education, the Christianity is outstanding in high education,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education. Catholic missionaries paid more attention than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on philanthropy, the later enthuse social reformatin and social relief.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western religions introduction on Northeast community. The spread of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ty created a group of people whose belief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ism. Which made the religious relief complex, and caused conflicts among them. The various social undertakings missionaries run comform to the need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mpersonally, and accelera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Undoubtedly, most of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as invaders. They lorded relying on their privilege of propagandism, extorted compensation of regious cases, accroached homestead, tyrannize, so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western religions is as clear as their positive function.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Northeast; Catholicism; Christianity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李国辉 日期：2007.6.9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李国辉 指导教师签名：王景海
日 期：2007.6.9 日 期：2007.6.9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_____

电话：_____

通讯地址：_____

邮编：_____

引 言

宗教是一种历史悠久、内涵复杂的人类文化现象，宗教问题是我国政府一直比较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洋教传播史的研究对于政府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加强对东北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问题的研究，从中探索规律，引导基督教组织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振兴东北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清末东北洋教传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东北史中的清末洋教研究

东北史当中的清末洋教研究，李治亭的《东北通史》^①、杨余练等的《清代东北史》^②、王魁喜等的《近代东北史》^③、佟冬的《中国东北史》^④等都集中在洋教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以及东北人民的反侵略反洋教斗争方面。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洋教通过鼓吹武力侵略，攫取特权，收集情报，宣传帝国主义的商业和文化，拉拢和收买一部分中国人组织叛逆活动等手段，来为列强征服中国服务。正因为洋教有如此大巨大的作用，所以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侵略者，才在强迫清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明确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地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教会作为列强在中国侵略的别动队，在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中，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东北人民的反侵略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30年间是教案的多发期。这其中包括呼兰教案、三姓教案等。伴随着教案的是东北人民的起义，李国荣的《光绪十七年热河金丹道教起义》^⑤叙述了1891年热河朝阳金丹道教起义，这次起义将东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推向高潮。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北的反帝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时期的东北洋教遭到了严重打击。在义和团运动中，90%的教堂被焚毁。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猛烈的反侵略斗争中，也吸取了教训。它于义和团运动之后，做出了教士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代理词讼的规定，以尽量减少与东北人民的直接冲突。被摧毁的教堂及各种慈善机关又相继重建与恢复，洋教在东北的传教活动自然又出现了新的迅猛发展的趋势。

二、宗教史中的东北洋教研究

宗教史中的东北洋教研究，目前来看相对薄弱。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⑥，是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一部影响较大的中国基督教通史全史著作。这本书详细的叙述了基

^①李治亭：《东北通史》，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②杨余练等：《清代东北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③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⑤李国荣：《光绪十七年热河金丹道教起义》，《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

^⑥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基督教在中国的事工以及基督教传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可查到的关于东北洋教研究的成果，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东北的传播以及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北洋教教难，但内容寥寥。孙善玲的《近代基督教传华的两种传教方式》^①、吕厚轩、张伟的《清末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改变述论》^②介绍了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两种传教方式和清末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的改变。陈中惠的《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差别》^③、刘世龙的《试析天主教和新教在华活动的区别》^④介绍了天主教与基督教以及两者在中国传教的区别。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⑤介绍了在向中国传教过程中传教士的重要作用以及著名的传教士，传教士对于近代中国的科技文化、社会进步的影响。罗伟虹的《中国基督教》^⑥、晏可佳的《中国天主教》^⑦则详细介绍了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朱维铮的《基督教与近代文化》^⑧、曹增友的《传教士与中国科学》^⑨则介绍了洋教传入对于中国科学文化的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这些论著中对于东北洋教的研究成果寥寥，更多的是在研究思路可以提供借鉴。其他宗教史中的东北洋教研究莫不如是。

本文试图考察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清帝退位期间洋教传入东北情况，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宗教侵略扩张的同时，分析出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清末传入东北的洋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这其中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的发展十分迅速，影响较大，因此这两大宗教将是本文写作的重点。清末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地深入内地进行传教。洋教的传入是与不平等条约相关联的，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洋教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清末洋教在传播的过程中，除了正常的传教活动之外，在东北进行的其他活动包括医疗、慈善、教育和社会改良事业。这些活动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社会的进步。上述各项将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问题。

说明：1.历史上，“中国东北”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等地区。本文取狭义之说，仅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

2.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教派，狭义的基督教专指新教。新教在近代中国也被称作耶稣教、福音教、更正教、誓反教、抗议宗等。本文中的基督教取狭义之说，专指新教。

^①孙善玲：《近代基督教传华的两种传教方式》，《国际政治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②吕厚轩、张伟：《清末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改变述论》，《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③陈中惠：《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差别》，《四川统一战线》，2003年第3期。

^④刘世龙：《试析天主教和新教在华活动的区别》，《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

^⑤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罗伟虹：《中国基督教》，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

^⑦晏可佳：《中国天主教》，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

^⑧朱维铮：《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⑨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一章 清末洋教传入东北的情况概述

一、清末洋教传入中国概况

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均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的不同派别，这两个教派在清末是随着不平等条约一起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清政府于 1842 年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广州等五个开放的通商口岸，成为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的基地。1844 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包括有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自行建造医院、礼拜堂一款：“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①

1844 年 10 月，中国和法国签订《黄埔条约》。根据第 22 条，不但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医院、学校等，而且清朝政府还承担了保护教堂的义务，“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集院、学房、坟地各项……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②

中方参与《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两广总督耆英于 1844 年 12 月上疏道光皇帝，要求弛禁天主教。1846 年 2 月，道光颁布上谕：“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象，诵经讲说，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现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③传教士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华人习教和归还教产的权利。但出于维持统治稳定性的考虑，清王朝这时禁止西方人擅自入内地传教，并且道光帝严禁营兵、衙吏、旗人以及一切在官之人及贡监生员入教，如有人入教，则依定例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很快就被打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列强相继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④《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也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⑤天主教传教活动扩大到中国内地省份。1860 年 10 月，中国与法国签订《中法续增条约》，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艾美贿赂中国官员，在第六款中私自添加进“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条。^⑥此条款理应视为无效，但是法国政

^①王铁崖编：《中外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7 年版，第 54 页。

^②《中外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62 页。

^③李刚己：《教务纪略》卷首《恭录、諭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版，第 3—4 页。

^④《中外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97 页。

^⑤《中外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107 页。

^⑥《中外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147 页。

府从未提出更正，而中国政府非但不据理力争，反而在 1865 年由总理衙门下达命令予以默认：“查内地建堂，由来已久，但传教士究系外人，如买地为建堂，其卖契内只可载明卖作本处天主教堂公产字样。若系洋人在内地置买私产与条约不合，仍应禁止。此后如有教士在内地买地建作教堂公产，即照咨内事理妥细查明办理，勿任混淆”。^①天主教传教士“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特权竟然被合法化了。

1899 年，清政府正式拟订了《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规定总主教、主教品位与总督、巡抚相同，大司铎、司铎品位与司、道、府、州、县相同，“所有地方官员接待教士，必须按照品位，以礼相答”。^②教民发生纷争时，应由教会中品秩相当的教士与同级中国官员，转请外国公使或领事会同解决。这无疑就是把中国的司法大权拱手让给了传教士。外国传教士得此章程，气焰更加嚣张。安东县教士“每至县署必盛仪而后入”。^③

二、清末洋教传入东北的情况介绍

天主教与基督教传入东北，大致分两个路线：一是从北京，经热河，由奉天西部朝阳地区传入；一是从海上经营口、牛庄传入。

天主教方面，在清廷还在对基督教采取“禁教”政策的情况下，一名荷兰籍和一名华人神父以及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先后来东北地区进行传教活动。^④后因清政府为防范外国势力在华扩张，从康熙到嘉庆皇帝连续 130 年禁止传播天主教。清政府通令全国“违令者缉拿查办，官员信教罢官割职，平民入教遣新疆或黑龙江为奴”。^⑤1814 年贵州省贵阳两名天主教徒即曾被发配黑龙江为奴。^⑥

1693 年，罗马教廷将东北和蒙古地区作为北京教区的一部分，归法国遣使会管理。由于当时河北、山东一带很多天主教徒移居到东北和蒙古地区，因此从 1696 年开始，就有法国传教士到营口、朝阳一带传教。1709 年前后，一名法国传教士考察了东北各地，并绘制了东北地图。1830 年，荷兰的卡斯特劳同两名中国神父一起，向辽东地区的信徒巡回传教。

嘉庆 23 年(1818)年，吉林省长春厅恒裕乡附近迁来八户来自直隶地区的农民，形成小八家子屯。这八户人家中有五户在直隶时已经受洗入教。由于势力弱小，地处偏僻，该村并没有受到地方官员的打击。1840 年，法国外方传教会神父毕罗尔来到该村，修建了简易的教堂。1844 年，小八家子创立修院，开始培养华籍神职人员；1858 年，又创立圣母圣心院，开始培养华籍修女。该屯的丁安奉和李万珍成为最早的一批华籍神父。

1838 年，罗马教廷将东北和蒙古地区从法国遣使会的北京教会中分离出来，成立“满蒙”教区。主教府设在现河北省的崇礼县，委托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当时在西康的四川区教会的方若望被委任为教区主教。1840 年，东北教区由“满蒙”教区分出，方若望继任东北教区主教，在营口建立主教府，并仍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后不久，

^① 《教务纪略》卷 3《章程》，第 4 页。

^② 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260 页。

^③ 《安东县志》卷 7《天主教》，《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年影印本，第 872 页。

^④ 黑龙江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宗教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97 页。

^⑤ 《黑龙江省志·宗教志》，第 197 页。

^⑥ 《黑龙江省志·宗教志》，第 197 页。

方若望主教到达盖平的郊外阳关建立传教据点进行传教。

1845年5月，新任代理主教布鲁尼埃带着祷告书和耶稣受难像，非法进入阿勒楚喀城（今黑龙江阿城市）、三姓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和黑龙江中游赫哲族居住的拉哈苏苏等地传教。

营口开港为东北洋教传入打开了新的局面。

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的规定，牛庄被迫于1861年4月开埠。1861年5月，英国第一任领事密迪乐在与负责牛庄通商事物的山海关监督瑞麟的交涉中，以“牛庄距海口甚远”和停轮不便为由，进行无理要挟，“情近骄恣”。由于清政府的昏聩无能，英国于同年6月11日强行在营口设立领事馆，但对外仍用牛庄的旧名。营口开港，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东北打开了大门。

伴随着商品的侵略，西方教会势力也逐渐渗入东北各地。营口开港不久，清政府谕令奉天旗民地方官，“向该国领事官言明，牛庄、下没沟新设埠口，该夷如欲建盖天主教传教，听其自便。”^①外国教会势力在东北得以迅速发展。

1889年，天主教在东北分设南北两大教区。“南满教区北以吉林省为界，南以鸭绿及高丽为界”。^②统理奉天（今辽宁）全省教务，总堂在沈阳，主教是法国人纪隆。“北满教区其境南尽于奉天界。西尽于蒙古。北与东均限于俄地。”^③统理吉林、黑龙江两省教务，总堂在吉林，主教是法国人蓝绿叶。

义和团运动时期，在反抗外来侵略和盲目排外的背景下，东北天主教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庚子之乱，教堂尽毁，惟二四处存。育婴堂、小学堂等毁灭无遗，教友被难死者不甚众，大都匿迹山中。”^④

义和团运动后，东北天主教得到了大量的赔款，被焚毁、损坏的教堂及其附属事业得以重建，伤害传教士的地方军、政官员遭到惩处。与此同时，天主教本身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传教士的政治活动和任意插手于民教纠纷，大力兴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努力改善其社会形象。这一时期的东北天主教事业蓬勃发展，教民人数不断增加。

基督教相对天主教进入东北较晚。1852年，德籍传教士郭实腊从暹罗（今泰国）乘鸦片船来东北出售《圣经》，先到锦州，继而到营口。因当时河口结冻，所乘船只胶滞难行，改由盖平县（盖县）下船，地方官予以优厚的接待。^⑤这样，东北才开始有了基督教的传播。

1863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韦廉臣受苏格兰“圣经协会”派遣，第二次来华。1866年韦氏由芝罘（今山东省烟台市辖内）泛海，登陆牛庄，经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市境内），先后到阿什河（今阿城市），三姓（今依兰县）等地散发《圣经》，游行布道。^⑥

关于韦廉臣传教的事迹1868年4月25日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法国人入境活动事致吉林将军三姓副都统咨文呈稿中提及：“四月二十二日未刻，突有洋人一名，跟

^①吴文衡：《营口开港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东北》，《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2期，第144页。

^②李枋：《拳祸记》，下册，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9年版，第228页。

^③《拳祸记》，下册，第264页。

^④《拳祸记》，下册，第264页。

^⑤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辽宁省志·宗教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⑥《黑龙江省志·宗教志》，第242页。

随从人四名，坐载小车二辆进城……据该洋人声称，系法国传教士韦廉臣，由伯都讷一带抵堡……该洋人即在街市售卖书籍，声称系耶稣修身之书。”^①

相同记载在《满洲宗教志》中也有提及：“1866年，英国圣书会社传教士从牛庄登陆，到东北散发汉译《圣经》，足迹远达扶余、阿城、三姓（今黑龙江依兰）等地”。^②

基督教“清同治间，渐入中国北部。同治六年，始在营口设立福音堂”^③。1872年，苏格兰长老会和爱尔兰长老会开始正式向东北派牧师传教。1870—1880年间，苏格兰长老会将其在山东的传教工作由烟台迁至东北。1876年，苏格兰长老会在奉天小北关租房设堂讲道。1883年，东北成立万国圣书会社，分别由奉天、牛庄、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向东北各地销售《圣经》。1891年，苏格兰、爱尔兰两宣教会正式在奉天设立关东基督教长老会，统摄全东北的基督教。两长老会于东北协同步伐，联合传教。

在东北地区，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都是捷足先登，而丹麦路德会的传教士接踵而至。1893年，丹路德会传教士柏卫来东北。1895年，该会外德劳继至。^④路德会与爱尔兰、苏格兰长老会协商后划得沿海若干地区作为布教场所。第二年在旅顺及大孤山设教堂，逐步推广到岫岩、安东（今丹东）、宽甸、恒仁、大连、绥化、哈尔滨、通化、瓦房店等地。

1910年前，“东北三省共有总堂25所：爱长老会（9所）、苏长老会（7所）、丹路德会（8所）、英圣经会（1所）”。^⑤

三、清末洋教在东北的分布情况

笔者根据所能掌握的资料，对清末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东北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

天主教方面，1878年，法国传教士在东北达19人，建立大小教堂36座，小学48所，教徒达9792名。^⑥至1884年，天主教徒达12530人。^⑦

1893年2月6日《将军衙门为复查境内所设教堂情形呈》中记载当时已查明黑龙江将军辖区内呼兰、绥化两厅共设教堂5处，即：“呼兰厅本街设有教堂一处，系法国人传天主教，教士孟若望，有女学房一所……双山堡东北方子屯设教堂两处，院内各修草房一所，均系传教士孟若望不时前往传教处所……小石头河设教堂一处，亦系法国人传天主教，教士舒惟尼……以上呼兰厅教堂四处，各房均系华式。绥化厅本街设教堂一处，房屋二十五间，均系华式。该教堂仅有教士一名，系法国人，姓卜名类思，传天主教，男、女学房一所”。^⑧

1900年前，天主教在奉天省有大小教堂42所，中外传教士31人，教徒17500人。

^①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0页。

^②[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大连：满铁社员会，1940年版，第269页。

^③王树楠等编：《（民国）奉天通志》卷99，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委会，1983年影印本，第2273页。

^④[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⑤《中国基督教史略》，第224页。

^⑥《满洲宗教志》，第225页。

^⑦《1884年—1894年牛庄海关报告》，第97页，转引自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页。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十六—二十一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223页。

在吉林、黑龙江两省有大小教堂 27 所，中外传教士 13 人，教徒 9000 人。^①同一时期中国天主教信友人数，“1900 年是七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二。1907 年初次达到一百万的标记。1910 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九万二千二百八十七人”。^②1900 年东北天主教教友人数占全国的 3%。

下表是 1906 年—1910 年东北部分地区天主教信徒的分布情况：

表 1：1906—1910 年东北天主教信徒人数统计表^③

时 间 地 点	1906 年	1907 年	1908 年	1909 年	1910 年
法库厅	1031 人				
农安县		1312 人			
通化县				203 人	
海龙府			526 人		
柳河县		184 人			
西安县（辽源）			300 人		
东平县					211 人
镇安县（黑山）		385 人			
绥中县			五十六户		
宽甸		56 人			
彰武县			85 人		
盖县			168 人		
铁岭		442 人			
昌图府			1000 人		
康平县			106 人		
新民府		503 人			
辽中县			2243 人		
复县		53 人			
义州	350 人				

基督教无论在教堂的数目和教民人数方面，相对天主教都要逊色一些。1891 年，东北基督教教徒已达到 2000 人。^④1896 年，耶稣教徒发展至 5800 人。1898 年，增至约 19600 人。^⑤

下表是 1906 年—1910 年东北部分地区基督教信徒的分布情况：

^①《拳祸记》，下册，第 228、264 页整理统计整理。

^②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第 93 页。

^③根据《东北乡土志丛编》制。

^④《1882—1891 年牛庄海关报告》，第 98 页，转引自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92 页。

^⑤施督阁：《奉天三十年》，矢内原忠雄译，《矢内原忠雄全集》，第 23 卷，东京：岩波书店，1942 年版，第 122—123 页，转引自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92 页。

表 2: 1906—1910 年东北基督教信徒人数统计表^①

时 间 地 点	1906 年	1907 年	1908 年	1909 年	1910 年
法库	864 人				
农安		177 人			
通化					
海龙府			287 人		
柳河县		69 人			
西安县(辽源)			80 人		
东平县					127 人
镇安县(黑山)		241 人			
绥中县			113 人		
岫岩				8 人	
宽甸		二十余人			
彰武		93 人			
盖县			120 余人		
铁岭		520 人			
昌图府			六七百人		
康平县			116 人		
新民府		1065 人			
辽中县			841 人		
复县		224 人			
义州	330 人				

表 1 与表 2 呈现的是东北部分地区在 1906—1910 年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人数分布：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人数为 9270 人，基督教人数为 5995 人。

除了教民人数，教堂、教会的数量也是衡量天主教与基督教发展水平的标准。

通过整理得出的清末东北天主教堂分布：

表 3: 清末东北天主教堂分布表^②

天主堂名称及地址	建立年份
农安县合隆镇小八家子村天主堂	1840 年
朝阳松树嘴子天主堂	1856 年
公主岭市和气乡民助村天主堂	1860 年
锦西市连山区天主教堂	1861 年
农安县合隆镇小八家子村天主堂	1863 年
海城牛庄天主教堂	1869 年
巴彦中兴镇天主教堂	1874 年
铁岭银州区天主教堂	1875 年
鞍山沟家寨天主堂	1877 年

^①根据《东北乡土志丛编》制。

^②根据《吉林省志·宗教志》、《黑龙江省志·宗教志》、《辽宁省志·宗教志》、《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整理而得。

奉天南关天主教堂	1878年
木兰县天主教堂	1879年
辽阳天主教堂	1879年
绥化厅本街天主教堂	1881年
公主岭市莲花山乡赵家围子村天主堂	1883年
扶余市四马架乡苏家村天主堂	1885年
锦州黑山天主教堂	1886年
阜新市民主村教堂	1886年
磐石县磐石镇东宁街天主堂	1888年
通化市二道江区清真寺路天主堂	1889年
公主岭市育林乡西山村天主堂	1890年
朝阳天主教堂	1891年
阿城北门里天主教堂	1894年
铁岭市铁岭县新台子镇安心台村教堂	1895年
安东自新街教堂	1895年
公主岭市莲花山乡五道泉子村天主堂	1897年
开原天主教堂	1895年
梅河口市中和镇白家堡村天主堂	1897年
桦甸县桦甸镇新华街天主堂	1898年
长春市南关区东四道街天主堂	1898年
扶余市新民乡河西村天主堂	1899年
敦化市民主街天主堂	1901年
铁岭西丰县西丰镇东街教堂	1902年
龙井市八道乡八道村天主堂	1903年
吉林市昌邑区维昌街天主堂	1904年
琿春市园丁街天主堂	1907年
方正县天主教堂	1907年
呼兰府城本街天主教堂	1908年
辽源市龙山区谦宁街天主堂	1910年
长岭县利发盛乡建设村天主堂	1910年

通过整理得出的东北基督教堂分布：

表 4：清末东北基督教堂分布表^①

基督教教堂名称及地址	建立年份
沈阳市东关教会	1876年
铁岭教会	1878年
双城隅宣献街教堂	1886年
长春市西五马路教会	1886年
开原耶稣教堂	1889年
梅河口市海龙镇铁西教会	1892年
阿城南门内大街教堂	1892年
梅河口市山城镇中街教会	1893年
一面坡基督教堂	1894年

^①根据《吉林省志·宗教志》、《黑龙江省志·宗教志》、《辽宁省志·宗教志》、《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整理而得。

兴城教会	1894年
五常基督教堂	1894年
宾县基督教堂	1895年
通化市东昌区新华大街教会	1895年
本溪湖教会	1895年
敦化市敦化镇民主街教会	1897年
琿春市新春街教会	1901年
通化市二道江区桃源路教会	1902年
宁安基督教堂	1904年
安东基督教女教会	1905年
辽阳教会	1907年
辽源市西宁街教会	1909年
方正县方正大街教堂	1909年
安东大东沟基督教堂	1909年
大连北京街礼拜堂	1910年
洮南市光明街教会	1911年

通过分析上述表3与表4内容可以知道清末东北天主教与基督教分布的一些特点：无论天主教与基督教都是在列强努力向内地渗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教堂早期多分布在地方沿海中心、经济中心以及交通线附近。教堂的数量方面，1861年营口开港前天主教有3座教堂，基督教则没有；1900年前，天主教有教堂30座，基督教有15座；1900年后至清朝灭亡，天主教增加9座，基督教增加12座。教堂数目大规模增长是1861年至1900年这一阶段，1861年前是因为营口没有开港，列强势力还没有大规模进入东北，而1900年庚子之役结束后，天主教与基督教都得到了大量的赔款，但由于人们担心入教后会再次受到伤害，因此教堂数量虽有增长，但并不显著。在地理分布上，对于基督教而言，教堂分布呈现由通商口岸扩及各城镇、交通线一带的特点。天主教除了早期有这样的特点外，更多的是侧重于内地，深入农村。

第二章 清末洋教在东北的活动

一、天主教与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异同

天主教和基督教两者在华活动的做法上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对天主教而言，“天主教之传教士终身不娶，其教友之守童贞者亦有之。教士之名分视耶稣教牧师较为尊贵，每以司铎自称，以跪见礼待其教友，教友称之曰：神甫。所传之道亦无关于基督所用之书亦即新旧约书，特分门别户，教规不同，其供奉者为圣母马利亚”。^①

耶稣教，“基督教之新教也，出于天主，经马丁路德之改革因立异号”。^②“教友以平等待遇且可独身信奉，不及一家，较之天主教无教皇之尊严，无神甫之束缚，无全家信奉之挟制，故耶稣入中国虽晚于天主教而信奉者转多”。^③

就思想方面来讲，耶稣教趋向自由、个人主义，教民得救与否，以其个人之信仰及言行为主要依据；天主教则着重宗教上的礼仪及教士的职权，教民须切实遵行，其得救于否，固以其个人信仰为主，但尚须借重教士的指引。教皇有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利，教士是教民与上帝之间的仲介人，非藉其力，不能得救。

天主教和新教在各自内部组织上的一致性和协作方面是很不相同的。天主教徒表现的团结比新教徒强得多。17世纪设立了一个梵蒂冈的专门机构——教廷传信部，以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在华天主教各修会虽然国籍不同，但基本上是以罗马教廷为中心，以法国为“保护国”，同时接受各自政府的节制。1900年之后，罗马教廷加强了对中国天主教的直接控制，同时各修会仍然受派遣国的节制。天主教各修会都信仰和宣讲同样的教义，承认和实行同样的圣礼，服从同一个权威。在教区划分上都有长期比较固定的活动范围，较少互相干扰。各个修会的行政、经济都是独立的，但各个修会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一般都能相互配合。基督教的差会^④在组织上是相对独立的，没有一个中心，但是各个差会还是要受派遣国的节制，听命于驻华公使和领事馆。各个差会依照自身的实力划分传教区域，在行政、经济上都是独立行事。^⑤

在经费方面，在华天主教会的封建性的集中体现就是霸占田产，租佃剥削。同时一部分依靠教徒的捐献，一部分来自国外的捐款，另外附属事业也有一些剥削收入。同在华天主教会“广置田产，收课渔利”^⑥不同，在华基督教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他们本国的团体和个人的捐助”。^⑦基督教从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就接受资本家的捐款，包括在华各

^①《开原县志》卷8《宗教》，《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800页。

^②《兴京县志》卷9《宗教》，《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277页。

^③《开原县志》卷9《宗教》，第800—801页。

^④差会：西方各国基督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

^⑤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

^⑥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137，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9939页。

^⑦兴替：《中国与日本的主要问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83页。

国鸦片商的捐助，各个差会主要依靠募捐和教徒的捐献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当时有人做过这样的比较，“购地掌业……前会（在华天主教会）较后会（新教教会）为甚。教中神父，于择地建堂诸事，皆极精能，且善于治生，广置田宅，经营蕃息……佃田赁屋，概凭大道生财。用是此会（天主教会）经费，半皆就地取材”，而新教“全赖资遣者供养”。^①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团体从经济来源相比较，前者带有一定的封建性，后者则是明显地资本主义性质。

在发展教会势力方面，在华天主教以吸收大量教徒为主，给以一定的金钱收买，一般都以整个家庭一齐入教，有的甚至整村人吸收入教。天主教会厉行教阶制，实行层层控制，大搞不受中国政令管辖的教民村，使教民对教会的封建性人身依附大为加重。教士对教民有宗教上的管辖，因宗教而牵连到生活上的许多问题，诸如饮食、婚姻、子女受洗等亦有规定。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比天主教晚，它们各自为政，从鼓吹个性解放的教义出发，着重对成年人的吸收，不搞教民村，很少设育婴堂。

在教育人才方面，天主教和基督教虽然目标一致，都是为传教事业提供人才，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天主教会一般只给教徒子女以小学教育或给以一定的职业训练，中等教育机关很少。对于他们认为有前途的学生，小学毕业后就让他们进小修院，以后再进大修院，再从其中挑选忠诚可信的尖子派送到罗马或者巴黎的神学院深造，回国后主要担任神职。作为文艺复兴一个组成部分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科学文化有着十分深厚的关系。中国甲午战前传播西学的工作，大都是基督教传教士做的；而更能容纳近代科技知识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则是基督教在华教育活动的重点。

在传教对象方面，天主教由于多年来充当封建统治的工具，侧重于在农村发展。因而，中国农民中天主教徒较多；而新教在资本家的指使下，往往企图借助政治势力，联系社会上层，以培育买办知识分子，所以多在城市活动。李提摩太、丁韪良等美国传教士都曾特别强调要深入到有教养的名流中去，许多新教徒利用科举赶考的机会散发基督教的书刊。在地理分布方面，“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耶稣教（新教）则不过通商口岸耳”。^②新教的传教据点多是由通商口岸扩及各城镇的，天主教则更侧重于农村，深入内地。

天主教与基督教上述不同导致了两者在东北地区传教采取的不同方式，以及在开办医疗、教育、慈幼等事业的过程中的侧重点的不同。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基督教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教育事业方面，天主教侧重于神学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小学教育，基督教在高等教育、中学教育、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成绩突出。天主教传教士要比基督教传教士更加注重开设教会的慈幼事业，社会改良及救济事业则是基督教的热心所在。

二、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

为了扫除传教的障碍，洋教传教士选择了创办医疗事业，同天主教相比，基督教在

^①必克：《支那教案论》，严复译，上海：南洋中学译书院，1899年版，第58页。

^②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合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页。

这一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虽然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将医药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但治病救人本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宗教本身而言，基督教之所以创办医疗事业，主要是与其教义有关。《圣经》中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耶稣传教时给人治病的记录，耶稣还教他的门徒给人治病以传教。基督教会将医疗当作“仁慈博爱的慈善”事业加以推广，许多传教士在爱心的驱使下甘愿效法耶稣从事治病救人的工作，教会内外人士也将教会医院视为慈善机构而乐于向其捐款。

东北基督教医疗事业由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开始。该会于 1869 年派传教士亨特经营口到奉天施医布道；翌年英国传教医士白兰德在营口创办普济医院。苏格兰长老会是在东北最早建立医疗事业的教会之一，成绩突出。1884 年，该会派遣医师、传教士司督阁来奉天开展施医布教工作，在小河沿买房应诊，经费“由司君劝募中西善士所捐助”。^①该院的规划设计在当时的教会医院中也比较完备，“楼舍一百六十楹，分设诊病、留养、储药、宣道各室”。^②医院的诊病规则是“按日施诊，内外两科。星期一、二、四、五为诊病期，三、六日为割病期”。^③1896 年，在医院北部，又建女施院，由苏格兰教会另派来和美丽与登大夫两位女医师，专门负责女医院的医疗工作。^④

这一时期东北基督教长老会历年所属医院见下表：

表 5：东北基督教长老会历年所属医院一览表^⑤

医院名称	地址	建立年份
盛京施医院	沈阳小河沿	1884
仁母医院	辽阳市	1886
普济医院	营口市	1896
仁爱医院	开原县	1896
善爱医院	新民县	1901
北镇施医院	北镇县	1905
妇婴医院	锦县	1905
基督教女医院	法库县	1906
高大夫医院	吉林市	1908
呼兰医院	呼兰县	1910

除以上医院，同一时期，东北建立的教会医院比较著名的还有：1886 年，英国医生白多马在锦州创办的锦州施医院^⑥；1893 年，英国爱尔兰人丁滋博医师在长春创办的长春基督教施医院^⑦；1890 年，英国医生高积善在吉林创办的吉林高大夫医院^⑧；1911 年，丹麦基督教国外布道会在岫岩镇创办的西山医院^⑨。

^① 《沈阳县志》卷 14《慈善》，《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年影印本，第 620 页。

^② 《沈阳县志》卷 14《慈善》，第 620 页。

^③ 《沈阳县志》卷 14《慈善》，第 620 页。

^④ 《辽宁省志·宗教志》，第 223 页。

^⑤ 《辽宁省志·宗教志》，第 225—226 页。

^⑥ 《辽宁省志·宗教志》，第 225 页。

^⑦ 《吉林省志·宗教志》，第 343 页。

^⑧ 《吉林省志·宗教志》，第 342 页。

^⑨ 《辽宁省志·宗教志》，第 224 页。

这些医院是东北近代最早的一批医院。清朝末期，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这些医院发展良好，得到了东北人民的信赖。

义和团运动时期，在反抗外来侵略和盲目排外的背景下，义和团对教会医疗事业以沉重打击。据1900年10月的不完全报道，沈阳、长春等6地的8所教会医院全被破坏。医学传教士纷纷退往沿海通商口岸或者回国，东北基督教的医疗事业陷入低谷。义和团运动后，教会医院得到重建，资金主要来自于庚子赔款以及教会内外人民的捐赠。教会医院的医疗水平较之以前大为提高。

丹麦路德会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同样取得了重要成就。1908年，丹麦基督教会安乐克教士在安东县天后宫街创办的安东基督教医院，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建立的医疗条件优越的教会医院。该院建“大楼一座，内分四层。二三层为养病室（单间与普通屋）、割病室、办公室（护士长）、沐浴室及西式便所凉爽平台等处，最上与最下两层为贮物室、茶水室、洗刷室、暖气炉等室。中舍三座，中座六间为普通养病室、试验室，门前平舍为候诊室、讲堂内外科诊病室、优待室、药剂室、谈道室、庶务室、回事处等，室外院平舍为厨房及职员寝室护士讲堂之用”。该院“每岁诊治二万余人，在院留养者四百五十余人”，常经费“小洋一万二千余圆，由丹国基督教老教会常年捐输七千余圆，安东海关每年薪金二千余圆，外有中西人士义务捐助及药膳费等收入三千余圆”。^①

安东基督教女医院“附设丹国医院，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八年创办”，该院“诊治规则及住院章程与男医院同”，并且“生小孩者随时可以治”。每岁“治诊一万三千五百余人，住院者二百六十余人，生产男女小孩二百九十余名”。^②

该院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诊治规则和住院章程，具体如下：

“每礼拜一、三、四、六午前九时开始诊治男人；

每礼拜一、三、五午后一时开始诊治女人（生小孩者产费小洋四圆贫者免随时可以免随时可请到女院或到家）；

礼拜日停诊（遇有服毒及紧急红伤例外）；

就诊者须在候诊室静坐。按先后次序发给号牌入诊室就医；

照规定时间就诊者每人小洋一角，一个月为期过期仍收费；

每日午前八时至十二时随时求诊者每次小洋二角，按时愿入优待室就诊者每次小洋五角。凡不按本院规定时间来诊者，服毒殴红伤等每次收诊费小洋一圆。在本埠内请求外诊者，每次小洋二圆。以上诊证先在回事处购买无证者谢绝；

每礼拜二、五两日本院割病，若有求诊者按上例收费；

患病者必经大夫诊验后始能定规可否留院，留则取保（保单院中代给）；

院费普通室每日小洋四角，单间屋每日小洋一圆，院费按月先付离院时清帐。蒙药一次以小洋三元为限，麻药一次以小洋二圆为限；

花柳症九一四针一次小洋三圆，汞针一次小洋一圆，验血小洋一圆三角，药费（一个月）小洋五角；

^① 《安东县志》卷6《医院》，第853—854页。

^② 《安东县志》卷6《医院》，第854页。

病人衣服被褥等由本院借给（牙刷牙粉自备）；

凡探望病人准在每日午后三时到五时，他时不得擅入，若有特别原因及单屋例外须先通知回事处”。^①

此外，丹麦路德会还于1911年在岫岩镇创办了西山医院。

医学教育是随教会医疗工作的展开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教会医院多培养助手或招收学徒，以弥补人力不足。1884年司督阁创办盛京施医院的时候，由魏晓达、洪步斗协助司督阁工作。1892年医院附设培养医务人员学校。1907年，盛京施医院重建的同时，招收李树华、李树德、李林荫、洪国璋、郭维潘等12名青年，进行医务训练。

但这种方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教会医疗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当时感到医务人才不足，司督阁建议成立医学校。1912年，英国长老会与丹麦信义会联合创办了奉天医科大学，这是当时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最高医学学府。学校规定修业年限为五年，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同年2月考取第一届学生40名。^②

伴随着教会医院传入，医学传教士将近代护理学也传入了东北。1884年盛京施医院创办，司督阁集医药和护理于一身。“缺乏经过培训的助手也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开始时，杜格尔德必须自己做每一件事情——检查病人、开方、配药、为手术准备器械和备品、实施麻醉、进行手术、包扎伤口，以及所有关于术后护理方面的必要指导”。^③同年伴随着医疗业务扩大，相继招收少数男“侍疾”承担初级护理工作。1885年英国长老会派田露丝护士来华，成为东三省第一位专业护士。1896年，盛京女医院建立后，“附设产科学堂一处”。^④训练出许多助产士。1911年，盛京施医院设产科，以带徒方式训练护士、助产士。

吉林高大夫医院在其存在期间，1896年开始在医院楼内举办医助培训班，先后办八届（1934年停办），招收学员共165人，学制5年，不收学费，培养西医医助，考试合格发给爱尔兰苏格兰长老会签发的医师证书。^⑤

三、教会的教育事业

教会学校是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工具，但教会学校的教学活动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由于“伊时反对外人之举最烈，故外人用种种方法使中国人民信任，而斯时适谋教育普及，实行开放门户主义，化除国籍界限，教会即开学校”。^⑥

对于教会学校办学的目的，1877年，传教士狄考文针对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指出，“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教化”，“要使基督福音普降全世界”，“青年教育无疑是获得一种

^①《安东县志》卷6《医院》，第855—857页。

^②《辽宁省志·宗教志》，第226页。

^③【英】伊泽·英格利斯著：《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张上尊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④《沈阳县志》卷14《慈善》，第620页。

^⑤吉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⑥【美】露懿思，《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之情形》，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重要地位的手段”，“甚至比军队更为有力和重要”。因此，他提出：“基督教会应把教育作为它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把教育这项伟大的工作留给世俗社会去办”。^①至于“兴办教会学校的目的，我认为是要对学生进行智力的、道德的与宗教的教育，不仅使他们皈依上帝，而且使他们在信仰上帝后能够成为上帝手中捍卫和促进真理事业的有效力量”。为了论证教会兴办学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还进一步指出：“第一，教育是培养一批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的重要手段”。“第二，教育对于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第四，教育在中国是晋升到上等阶层的最佳途径”。“第五，教育在使本地教会自力更生，促进教会反对内部迷信思想的侵蚀以及抵抗外来训练有素的人所发起的怀疑主义的进攻方面是十分重要的”。^②

教会将开办学校作为其传教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1906年，清政府学部《咨行各省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其中规定：“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与奖励”。^③实际上对教会学校采取放任政策。

经过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教会学校形成了与现今的教育大致相同的体制：学龄前教育为幼稚园，小学教育分为国民学校（学制四年，即初小）和高等小学校（学制二年，即高小），中学教育分为中等学校（即初中、高中）和职业学校，高等教育为大学。

东北地区的教会学校是随着传教事业的展开而发展壮大的，分为神学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方面。

（一）教会的神学教育

1. 天主教的神学教育

神学教育是专门培养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一种教育。神学院，也称修道院，是专门培养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学校，分备修院、小修院、大修院三类。备学院即神学院预科，主要学习高中课程，同时选读拉丁文；小修院主科为拉丁文文学及古典文学，一般学制3年；大修院学制一般为6年，设经院哲学、圣经学、教会法典、宗教礼仪，神修学、伦理神学和神义神学课程等课程。备修院学生毕业后，学习优秀者送小修院学习。小修院毕业后，品学兼优者可推荐入大修院学习。大修院毕业生经教区主教的考核，可升为神父：

1880年，满洲教区主教杜公斯当在辽阳县沙岭镇创办拉丁修院。该院是天主教满洲教区最高学府，专门培养天主教神职人员。修生毕业后，可管理教会和为教徒施行圣事。1906年正月，南满教区主教苏裴理斯将辽阳的拉丁修院迁至奉天，成立了奉天天主教神学院，地址在奉天大西区隆昌街六十四号。神学院分为大修院和小修院，讲授拉丁文和

^①[美]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②[美]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8—11页。

^③两江学务处编：《学务杂志》第六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版，第1077页。

社会科学，由中、法教师各 2 人授课，在校学生 56 人。^①

1883 年，东蒙教区主教吕继贤，在朝阳县大屯乡下庙汤建立修道院，专门培养中国籍传教士。1893 年，该修道院迁到松树嘴子。该修道院学制为 12 年，前 6 年学习文化课、拉丁文和教会知识；后 6 年学习哲学、神学和教会礼仪等课。每 3 年招收一次学员，均来自圣母圣心会各教区的男性青年。^②修道生学期期满，考试合格、品学兼优者可升为神父。当时西湾子、绥远、集宁和宁夏等教区的修生，都必须来这个修道院接受神学和哲学教育。

修会是天主教修士、修女修道的组织。耶稣圣心门徒会是建立较早的男修会，1910 年，热河教区为了发展公教教育，提高师资水平，开拓传教事业，由当时比利时籍副主教南阜民于朝阳松树嘴子创办“耶稣圣心门徒会”。这个修会成立后，先后在松树嘴子、朝阳镇、山湾子、平泉、赤峰、西湾子、林西设 7 个修会院。修会入会者必须是虔诚的男性青年教徒。入会后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望修，发“三愿”才能成为修士。^③

修女是天主教教职人员的一种，指离家进入修会的女教徒。正式修女需经修女院的学习，毕业时发初愿（绝财、绝色、绝意），才由望修、初学成为正式修女。修女发愿有两种，一种是 45 岁以前发誓愿，每年一次；一种是 45 岁以后发终身愿。按天主教传统，一个教区必须有神学院和修女院。修女从修女院毕业后，一般安排到各教会，从事传教活动；或在教会事业机构中服务。

历史上修女院入学条件一般是：年满 18 周岁，天主教家庭出身，本人自愿，父母同意。修女院主要课程有：圣经、神学、教会史、院规、宗教、音乐、外语和文化课。学制一般为 4 年。

这一时期东北比较著名的女修会包括：1858 年在农安县小八家子创办的圣母圣心贞女会母院；由东蒙教区第一任主教吕继贤于 1883 年在朝阳松树嘴子创办的圣母中保会；1887 年在长春西三道街创办的长春圣方济各传教修女会。

2. 基督教的神学教育

基督教神学教育方面比较著名的是东北基督教神学院，该院创办于光 1894—1897 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属苏格兰宣教会及爱尔兰宣教会联合在奉天开办学道班，即初级神学。每年召集东北地区各教会传道人，按时轮流培训，学期一个月，传授圣经课程。1898—1913 年，学道班进一步发展成为奉天神学院。学制四年，课程安排都是与圣经有关的内容。发给证书后，便有封立为准试（副牧师），聘用为牧师的资格。

同一时期的基督教学校还有丹麦路德会于 1909 年在凤城镇建立的女子圣经学校等。

（二）教会的学校教育

1. 教会的高等教育

教会大学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像西方对中国发生影响的许多事例一样，教会大学的建立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而不是中国人的需要。”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大学的目的是，就是要培养能效忠于教会的中国领袖人物。他们公开宣称：“为中

^① 《辽宁省志·宗教志》，第 266—267 页。

^② 《辽宁省志·宗教志》，第 266 页。

^③ 《辽宁省志·宗教志》，第 268 页。

国赖近高等教育先河之导，及以为政治、实业、教育、宗教各界中造就名贵领袖。”^①

在东北高等教育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基督教。奉天医科大学由爱尔兰长老会与丹麦信义会联合创办。当时司都阁医师受基督教苏格兰长老会派遣创办盛京施医院后，为解决医务人员不足问题，1892年在医院附设培养医务人员学校。1908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他较重视医疗事业，为此多次和司督阁晤谈，敦促司都阁成立正式医校，造就医务人员。当时拨出施医院东侧一块公地作为校址，并且10年间每年政府补助白银3000两予以支持。为此，司都阁一面在英国募捐银款，一面聘请教授积极筹备开办。当第一批教授到达时，正值奉天鼠疫猖獗，嘉克森医师未等休息，即到皇姑屯车站开展防治鼠疫工作，不幸染疫殉职。继任的总督锡良感其见义勇为，由防疫费中拨出一万银元，作为眷属赡养费。嘉夫人悉数捐于医校。总督又慷慨捐赠9000银元。1911年，基督教信义会丹麦医学博士安乐克来奉天与司都阁一道，汇集嘉克森恤金、锡良总督捐款，以及从英国募捐的钱，兴建4层大楼一座（含教会和宿舍）。

1912年，奉天医科大学成立，这是当时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最高医学学府。学校规定修业年限为五年，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每一年招生一次。同年2月考取第一届学生40名。9月成立学校董事会，聘请中国、英国、丹麦三国的知名人士为董事。

奉天文会书院：该学校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02年11月1日，英国苏格兰与爱尔兰两个长老会在奉天大南关租用民房，成立一所小学，1904年增招初中班。1909年，该校迁到大西门外一经街，继续购置校地26640平方米，建四层楼房一幢。1910年学校主要建筑最后落成，定名为“文会书院”。^②

“文会书院”系大学性质，“以灌输普通科学，演绎基督教理为宗旨，中西教员十，学生八十九”。^③该院分为本科和预科。预科学制一年，学习普通课；本科学制三年，分法、理、医、工四个系。主要招收县教会中学毕业生及教友、长老和学校中教职员子弟，目的是普及耶稣教，传布西方思想文化，使教会领袖等适应时代潮流。^④当时的毕业生可以从事牧师、教员以及自选的职业，也有少数去英、美留学的。

2. 教会的小学教育

传教士们在总结小学教育的作用时说：“教会小学最初设立之宗旨为宣传福音。其目的在破除偏见，招致学生父母之信任，并在城镇中设立一种公认之教会机关，而使人信奉耶稣”。^⑤

天主教创办的初级小学很多，多附设于教堂内，几乎凡是有教堂的地方都建立了初级小学。虽然这些小学生主要是为信徒子女服务，但非信徒子女也可以入学。

基督教在小学教育方面同样做出了突出的成就。

1895年，英国传教士伊约翰来锦州布道，在锦县（锦州）东关福音堂（福德街）创立育三小学，为育贤小学之前身。最初招收初小一个班，多是基督教信徒子弟。教育经

^①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② 《辽宁省志·宗教志》，第227页。

^③ 《沈阳县志》卷4《教育》，第282页。

^④ 中华统一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一〇—一九二〇）》，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页。

^⑤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05页。

费主要靠学生学费支付，不足部分由奉天爱尔兰差会捐助。到 1912 年前后，育三小学有高等一个班，学生 25 名；初等一个班，学生 30 名。中国教师 3 名，美国教师 1 名。高小班课程有修身、国文、英文、算术、体操、音乐、图画等；初小班不设英文，其它课程和高等班相同。^①

1911 年，岫岩县基督教信义会附设三育小学正式设立。初期只有两个班级，40 余名学生，由信义会负责管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除使用当时普通小学课本外，《圣经》为学生必修课，而且每日必读。任课教师均为基督教传教士。

吉林市文化两级小学：1911 年英国女教士邸如春在吉林高大夫医院院内创办，接受爱尔兰苏格兰长老会津贴。办学宗旨是：招收信徒子女中的女童，讲授小学程度的文化知识，设圣经为必修课。

基督教会设立的其他小学包括：1897 年创办的榆树县文华小学；1901 年 9 月 13 日创办的海龙县朝阳镇成达学校；1903 年 3 月 15 日创办的柳河县孤山子文达小学等。

3. 教会的中学教育

居于教会中等教育核心地位的教会中学，在实现基督教教育事业中，倍受西方教会的重视，被称为教会体系中“一最重要之部分”。^②传教士狄考文将教会中学的发展这样表述，“中国基督教会下一代的中坚力量无疑将由我们的教会中学来培养”。^③

海城三育中学：1890 年，英国传教士马钦泰牧师来海城传教。除在县内广泛吸收教徒、积极扩展教会势力外，还成立了三育中学。校舍设在九仙庙下一家马姓民房。学生均为教徒子弟，不收学杂费，补助伙食和笔墨纸张等文具费。所学课程以《圣经》和英文为主，四书五经为次要学科。马钦泰亲自讲《圣经》，妻子教英文。另请徐老师教四书五经，请牛庄人王好古教算术、物理、地理等。当时称这些学科为“格致”。最初招收学生二十人。学习年限不定，以能学会英语会话、翻译简单信件和阅读英文报刊为结业标准。结业后由教会负责推荐职业。^④

新民文会中学：1907 年，由英国传教士孟中原以基督教会名义出资主办文会中学。校址设在镇南，从回民海姓家族购得，占地 30 亩，建校舍洋房三栋 30 间（今县高中校内东侧）。初创时办初级中学两个班，84 名学生，聘教师 9 人。1908 年，第一届毕业生仅 10 余人，学生来源除本县外，还有黑山、法库、辽中等县。所学课程，国文除《三字经》、《百家姓》外，以四书为主，另学数学、英语和书法。《圣经》作为必读课，且学生每天要参加宗教仪式或作礼拜。^⑤

4. 教会的女子教育

女子教育是教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女子学校之设，始于教会，继而国人也渐有私设学校者。这些教会和国人私办的女子学校，便打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一道

^①政协锦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锦州文史资料》，第九辑，1990 年版，第 98 页。

^②《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 179 页。

^③《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 14—15 页。

^④政协辽宁省海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海城文史资料》，1988 年版，第 18 页。

^⑤新民县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印：《新民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 年版，第 11—14 页。

窄门。”^①教会对妇女施以初等教育，精心教导基督真理，这有两重目的：一是训练其中热心和聪明的作为圣经读者，并在妇女中从事福音工作。二是使妇女以虔诚的生活和高雅的谈吐为基督教徒家庭增光，为异教邻居树立信仰基督福音的威力巨大的范例。“教会有了经过精心训练的妇女在不与他人往来的家庭里从事非专业性的传教，可以肯定是有大益处的，因为这些家庭牧师是难以跑进去的。同时，这些贤妻良母们的日常家庭生活是无可指责的，这样就成为黑暗中的明灯”。^②基督教在女子教育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基督教立育英女子小学校：此校由英国宣教士伊约翰于 1895 年成立。校址设在锦县东关双岔子基督教施医院内，初取名育英女子蒙养学堂。设校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基督教的宣传和培养基督教骨干。除教学文化课外，还让学生学习神学、作礼拜。招生最初只限教民子女，其后也招收非教民子女。当时的地方政府对它既未指导，也未干涉。1902 年，根据清朝的学堂课程，改女校为锦县基督教立育英女子两等小学堂。学生分初、高等两部分：初等修业 5 年，高等修业 4 年。高等小学设修身、国文、英文、算术、体操、音乐、图画等学科，初等不设英文。由于当时社会女子进学堂的风气未开，该学堂直到 1910 年仅有初、高等各一级，学生总共 50—60 名。^③

辽阳文德中学女校：辽阳基督教会牧师韩弥尔于 1897 年在东三道街教会院内，设立初级小学一所，招收学生十七、八名，因受旧礼教的影响，专收男生，另设女校。教会女校租用了四道街曹姓民房。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不许女子读书，但西方基督传教士提倡男女平等，设立女学，不收学费，所以一般信徒家庭受此影响，有适龄女子多送入学校读书。第一期有学生二十多名。课程有汉文，特聘汉儒负责教授，科学由英国人明教士负责教授。所有文具由学校供应。当时社会黑暗，流氓土混甚多，单身女子夜间不敢在街头行走，故女生多在校住宿，雇用厨役，设立食堂。庚子之变，处于安全考虑不得不解散。^④

长春萃文女子中学：地址在今长春市基督教会附近的西五马路小学，1907 年英国人金瑞慈（女）教士创办。先设立初等女校，定名长春纯粹女学堂。1912 年增招女子师范班，学生 50 余人，是基督教关东长老会创办的第一所女子中等学校。

同一时期的女子学校还包括：1895 年由英国基督教士邸回春创办的锦州学道馆，招收不同年龄的妇女，主要教识字启蒙和《圣经》；1911 年由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创立的奉天基督教女子师范学校。

5. 教会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指教会创办的学校除了教授学生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外，把传授职业谋生技能作为教育的重点。目的在于“传授谋生技能，以维持个人或家庭生活，平时又受有相当的宗教训练，大多数都能恪守人生的道德而取得人家的信仰”。^⑤

丹麦基督教立三育中学校，设立于安东县二区劈柴沟，1911 年由丹麦于承恩牧师及

^①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5 页。

^②朱有璠、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23 页。

^③政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学习文史办公室编印：《凌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9 年版，第 47 页。

^④辽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阳文史资料》，1985 年版，第 75 页。

^⑤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48 页。

安东教会领袖创立。该校“意在辅助中国教育之不足，以期培养中国青年以普通智识及实业之技能”。办学“首重园艺，定名曰园艺学校”。当时租用民房三间，聘教师一人，学生十一人，购买校地二百零六亩，建筑草房七间。办学经费方面，“开办基舍及常年经费皆由牧师艺人苦心筹措，民国二年因经费无著几至停办。适于牧师归国道出美洲，到处演说该校之宗旨。际有热心美人乐善好施，慷慨捐助美金若干圆。于牧师携款返华，复改收学膳等费，并售出苗木若干圆。遂增修校舍，扩充学级，高等生增至四十名，国民生三千余名”。^①

1912年，基督教传教士聂乐信在东沟孤山东关创立大孤山崇正女子学校，共有房产50间。为筹集建校资金，聂乐信招收贫民，教授工艺，设生产台布、花边工艺工厂，把产品行销国外。为工厂贫民子女设幼儿院，进而设立学校。时有高小2个班，初小4个班，初中3个班，师范一个班及2个幼儿班。学生中东北信义会15个教区信徒的子女占一定比例。《圣经》课为学生必修课，并规定星期日学生要到教堂作礼拜。

6. 教会在少数民族中的教育

东北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除汉族外，还有40余个少数民族。其中主要的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伦春、赫哲族等。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回族信奉伊斯兰教，蒙古族信奉喇嘛教，其他少数民族信奉佛教或者萨满教。少数满族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有加入其教的，但影响不大。真正大量信奉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是朝鲜族，少数民族教育主要指的是教会在朝鲜族聚居区开办的学校。

1860年，清政府废除吉林省境内的封禁令。19世纪60年代，由于朝鲜北部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灾民纷纷越过边界，在中国境内定居私垦。由于当时朝鲜是清朝的属国，清政府先是默认，继而在1875年废除奉天省（今辽宁、吉林的东南部）的封禁令，设抚民局，招民开垦。1885年，清政府把图们江以北地区划为专垦区，设越垦局，兼理朝鲜垦民事务，成立垦荒社，招徕朝鲜垦民，垦荒定居，建立村落。^②1899年9月，清政府同朝鲜政府签订《光绪二十五年中韩条约》，其中第十二款规定：“边民已经越垦者，听其安业，俾保其性命财产，以后如有潜越边界者，彼此均应禁止，以免滋长事端”。^③这事实上表明朝鲜政府在法律上承认了中国朝鲜族的地位。从此，包括1899年之前迁入中国东北的全部朝鲜移民，都获得了中国公民的资格。

基督教，大约从1867年前后开始在中国朝鲜族中间传播。1873年，英国的罗斯博士和他的妹夫麦因泰伊俄牧师来我国东北，在兴京、通化、临江等南满一带的朝鲜族中传播基督教。1876年，李应赞等四人受到上述两名英国传教士的洗礼，成为中国朝鲜族中最早加入基督教的人。1882年，罗斯博士带领白鸿俊等人，到奉天组建印刷厂，于这年秋天出版《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第二年又出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1887年出版《新约圣书》的剩余部分，最后汇集成《耶稣圣教全书》，这是用朝鲜文译成的第一部《新约圣书》。《圣书》的翻译工作是对朝鲜族传教的重大贡献。^④

^①《安东县志》卷3《教育》，第454—455页。

^②《朝鲜族简史》编撰组：《朝鲜族简史》，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③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四册，4419页。

^④韩俊光：《朝鲜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页。

1891年，又有两名外国传教士带领郑公斌、崔明梧两人来到东北，在奉天、通化等地的朝鲜族中进行传教活动。到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在东满和北满一带朝鲜族中的布教活动也相当活跃。1902年，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具礼善和助师洪淳国来到延边进行布教。此后，美国监理教会朝鲜的东亚基督教、安息日教会、圣洁教会等各派也相继派遣传教士到延边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其传教士能娴吾国语言习俗，教旨则以博爱为主”，“较天主教稍为平和”，因而教势日渐兴旺。

当时“敦化沿路有万国基督教、延吉铜佛寺额穆福音堂、宾县布道会、珲春洗礼会、延边及俄边有朝鲜基督教会”。^①1910年前后，信仰基督教的朝鲜反日民族主义者迁入柳河、兴京一带定居后，基督教传教士也随之迁入。

基督教在延边的传播始于1903年前后。是年，基督教英籍传教士到珲春、大砬子一带传教。1912年，基督教在珲春成立基督教讲书堂。1913年，在龙井设加拿大长老派教会，管辖范围达到珲春，曾先后在龙井兴办恩真中学和明新女子学校等。

同一时期基督教会在朝鲜族聚居区开办的比较著名的学校包括：长老会1909年在和龙县伊泉坪创办的勇新学校；长老会1913年在和龙县创办的勇化东信学校；长老会1913年3月在和龙县创办的救信洞崇信学校；加拿大差会1913年9月在延吉县朝阳川创办的明信女校；长老会1913年10月在延吉县创办的救世洞崇信学校等。

天主教，也是在朝鲜族中影响较大的外来宗教。天主教是于1899年前后传入延边开始在朝鲜族中传播的。当时天主教徒金英烈从朝鲜的元山回到家乡和龙县楼鹤台，在亲朋中宣传天主教，金钟烈等人到元山天主教堂受洗礼，这些人后来都从事传教活动。元山天主教堂又相继派遣具杰根（法国人）、洪泰华（德国人）等神甫和朝鲜人神甫到东北的朝鲜人聚居区布教。1905年，天主教在龙井、和龙县三丹峰设教堂。天主教神甫经常到各地农村布教、巡视教会活动，并开办海星学校、主日学校。

1904年7月，天主教会在珲春县黑顶子创办私立东光中学。同年，珲春天主教会在珲春街创办一所朝鲜族幼稚园。^②

据1910年统计，朝鲜族宗教界和外国传教士在东北三省建立的学校共有108所。其中基督教系统59所，天主教系统21所。^③

这些学校的创办，为东北朝鲜族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教会的社会改良事业

教会的社会改良事业包括很多方面，重点在于整饬中国教友的道德，对社会的移风易俗产生影响。“中国风俗的亟宜改良者，除破除迷信外，莫如烟酒嫖赌”。^④天主教罗马传信部禁止吸食鸦片。教会还禁止教友买卖妻女。传教士还努力改变着当地的一些陋习，如童婚和童养媳等，并指导农村教徒改善耕作，兴修水利。

教会对于东北人民戒除毒品作出了贡献。旧社会的东北，吸食鸦片是非常普遍的事

^①《桦川县志》卷6《宗教》，《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728页。

^②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教育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页。

^③《朝鲜族》，第30页。

^④《中国基督教史纲》，第339页。

情。“在中国的满洲，吸食鸦片是非常普通的，和许多种疾病有着重要的关系。据统计，沈阳成年男子中约有40%的人吸食成瘾，还有大批妇女，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妇女更爱好此道”。^①人们吸食鸦片的动机是：“最初，一些人使用鸦片是为了减缓疼痛，一些人使用鸦片是为了从痛苦和失意中解脱出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因为中国没有我们西方人这样的社会娱乐，他们的生活缺乏色彩且非常沉闷。但是，绝大多数吸食者仅仅把其当作一种奢侈，为了享受吸食时所引起的舒适和愉快”。^②

鸦片的危害在于“消化能力降低，重要器官的分泌减少，功能活动减弱，而且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远远不能与正常人相比，因此，鸦片吸食者特别易于感染急性疾病。在1883年霍乱流行期间，鸦片吸食者的死亡率是令人震惊的。中国人说没有一个感染上霍乱的鸦片吸食者会逃出那场劫难”。^③

为了戒除毒瘾，很多吸鸦片者纷纷到教会医院就诊。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盛京施医院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该院在开展戒毒工作时，早期为治愈患者采取的措施是用药丸，带有少量的吗啡并且逐步减少的滋补剂。在后期，医院采取的是把患者收入医院住院的办法治疗鸦片吸食者。“从一开始就切断毒品的所有来源，或者，如果绝对必要的话，在皮下注射少量的吗啡。对病人严厉规定，他们的体力和意志力都受到严格的考验。”^④并且，当时奉天的基督教会决定不为鸦片吸食者洗礼，直到其完全戒除这种恶习为止。

五、 教会的慈幼事业

旧中国“天下最困苦的人，莫如盲目聋哑与孤儿，特别在中国，这种人的痛苦更利害，因为一般社会对于他们没有什么救济的方法，譬如生一盲童，他的父母，看做一个废人，男的他学习星相算命，女的叫她学习歌唱做娼妓；一生命运，便入于悲惨之境”。^⑤

外国教会的慈幼事业包括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慈幼机关，是教会慈善事业的另一种形式。其目的与其他类型的慈善事业一样，是要博取中国人民的好感，发展教会势力。教会慈幼事业的大宗是举办育婴堂和孤儿院。天主教传教士要比基督教传教士更加注重开设这种机构，“凡在大城市里的天主堂差不多都设着一个育婴堂或孤儿院的。他们那些修女称为姆姆的人，都是担负着照顾婴儿与教育儿童的义务”。^⑥

1896年，圣书公会德儒博夫人闻北京将瞽字（盲文）可译为快字，并能用毛笔书写，故从北京聘请瞽人（盲人）刘俊溪到奉天借圣书会房舍教授妇女快字学习，不到3个月竟能朗读《圣经》，借此而认识汉字。这是东北应用瞽字之始。当时所用书籍，“系用硬纸制成凸字，读时以手代目，自左而右”。^⑦由于铁岭张永权牧师和快字教员史永爱支持，1902年正式成立奉天瞽文重明女学校并开始应用瞽文。课程设置曾有摸字、国语、算术、

^①《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336页。

^②《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336页。

^③《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337页。

^④《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338—339页。

^⑤《中国基督教史纲》，第344页。

^⑥《中国基督教史纲》，第347页。

^⑦《中国基督教史纲》，第345页。

常识、自然、历史、音乐、体育、英语、日语、缝纫、编织、烹饪等 14 科，设幼稚班（初学摸字者）、初小、初中三级。^①其教育方针是为失明女生设立类似基督化式的大家庭，教导他们学习技艺，作为生活补助，同时教导她们学习日常生活，并必需的文学和常识，可用于社会生产和服务人民。本校除免收学杂费外，对贫困学生的膳、衣等项，学校在可能范围内，酌情提供。除免收学生膳食外，按成绩优劣，工作勤惰，给以少许酬金。该校经费除差会及不同时代“政府”支持外，还自有耕地 39960 平方米，养鸡、羊、蜂等，种植蔬菜，并出售学生加工的编制品，作为经济支出。^②

1885 年，南满教区主教纪隆在奉天小南关天主教堂内创办的育婴养老院。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后，南满教区主教苏裴理斯在 1911 年重建。建院后收婴孩 80 余名，老人 50 余名。

由朝阳松树嘴子教会于 1893 年在朝阳松树嘴子创办的婴儿院，共收养 500 余名孤儿。该院收养的孤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可以进校读书，同时也学做一些针线活，还要学习“要理”和“经言”。婴儿院还规定只收女孩，不收男孩。婴儿入院时，家长必须在神父面前立下“甘愿奉献”、“生死和婚嫁不得过问”的字据。女孩到 16 岁就得出嫁，每嫁一个女孩，须交银元 50—80 元。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慈幼事业尤其是育婴堂实际上存在着很多问题。教会开办这种机构，是为了上报教徒增加的数字，拯救孩子们的灵魂上天，孩子如能幸存，就可以从小给予宗教的灌输和提供无偿的劳动力。但由于医疗保健等原因，在教会慈幼机关经常出现婴儿大量死亡的情况。一旦此类事情发生，教会人员往往掩盖真相，以致激起人民的疑惑和愤慨，这是许多教案的發生的重要原因。育婴堂长大成人的女孩子，必须要由修女代为择配，与信教的人结婚，决不允许自由婚姻。育婴堂和孤儿院可从匹配婚姻获取相当可观的聘金，至于婚后的生活如何则不在修女们的考虑之中了。

^①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教育志》，沈阳：沈阳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54 页。

^②政协沈阳市人东义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人东义史资料》，第五辑，1991 年版，第 115—117 页。

第三章 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

一、宗教信仰复杂化及相互冲突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造就了一群信仰与传统不同的民众。东北多数民众的传统宗教信仰是儒、释、道三教兼信。这是因为儒、佛、道之间有着一致的精神和共同的追求，三者之间经过长期的冲突和融合，互相渗透吸收，最终形成了以儒为中心的合流。传统的东北民众在孔子寿诞之期要去参拜孔子，在佛诞节日要瞻仰释迦牟尼，在吕祖爷寿诞又要登道观祭扫。除此外，东北民众还信奉包括天帝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及其他杂鬼百神崇拜的大众宗教，少数民族则多数信仰崇尚自然的萨满教。各地有各地的神，各行有各行的仙，神仙的世界如同人的世界一样，既有职业之别，又有等级之分。为了不冒犯任何一神，他们神神都拜，并为之建庙塑像，在其寿诞举行庙会，隆重祭祀。与此相反，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是人间的唯一真神，其他神都是邪神、假神；基督教还反对偶像崇拜。基督教徒从入教那天起，便不再尊崇传统宗教及民间诸神，只信仰耶稣基督一神。基督教徒由于宗教信仰的改变，从而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行为方式等方面也有多处偏离了传统，他们组成了与非教徒不同的异质群体。东北民众分化成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两类，基督教徒在信仰、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特权，因而传统社会出现了民教分野与冲突。

与此同时，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也产生了冲突。义和团运动后的几年，民教矛盾犹如骤雨初歇，相对缓和。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这时由民教矛盾引发的教案渐趋平息，而由不同教派矛盾引发的教派冲突却急剧增加。导致上述现象发生的原因有二：一是两个教派之间的门户之见。由于教义和历史的原因，天主、耶稣两教在西方国家原本就有积怨。进入到近代中国后，两大教派之间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分歧，关系一直不够和睦。同治年间，耶稣教会公开发表文章，声明“本朝有中国习天主教之人，藉教行恶，经官查办在案。此天主教之事，与我耶稣无涉”，天主教则撰文斥责耶稣教“诋毁天主教”，两教会间发生了小规模论战。^①1904年，中国天主、耶稣两教冲突已经非常严重，由著名耶稣教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登载“论天主耶稣两教在美洲之分别”一文，列数两教之差异，竭力攻击“天主教人掌权之地，恒用愚民之术”等等缺点，断言“天主教道一遇传福音之耶稣教道，决不能敌”。^②二是因为教民人数的增加。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和基督教都空前壮大，由此必然带来教民数量的大幅增加。入教之人多了，教民成分复杂，其整体素质就难免有所下降，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容易发生。

天主、耶稣两教会间既有如此的门户之见和攻讦之辞，再加上教民人数的增加及整

^① 《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抄》，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第1405页。

^② 《万国公报》，第188卷，1904年第8期，第4—6页。

体素质的下降，必然要影响到两会教民的关系，并导致两教冲突。如奉天开原县头台子屯，19世纪末此地天主教会“说耶稣教是劣教，与天主教仇敌，势不两立”。听说有人入耶稣教，此地天主教民立即“勃然大怒”，对“奉劣教”者加以打击镇压。

以下是1896年奉天教区发生的天主教与基督教冲突的事件：

表6：1896年奉天教区天主教与基督教冲突事件表^①

地点	事件
承德	天主教民彭金甲与其兄耶稣教民彭金城涉讼
开原法库门	天主、耶稣教民启衅
康平郑家屯	天主教民与耶稣教民口角斗殴，双方都有教民受伤，耶稣教堂窗户器具被砸毁
开原	天主教教会会长潘洪治率人扭殴耶稣教教民，致起交涉
新民屯	天主教和耶稣教民启衅

从表中可以知道，1896年奉天教区共发生了5起教民冲突的事件。教民之间的冲突使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从而使东北宗教信仰更加复杂。

二、清末洋教传入东北的积极作用

天主教与基督教传入东北，在传播教义的同时开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中国东北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加速了东北近代化的过程，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在天主教与基督教开办的医疗和教育事业体现的尤为充分，具体表现在医疗卫生功能的提高、社会救济事业、提倡新式教育三个方面。

（一）医疗卫生功能的提高

教会的医疗事业对解除东北人民的痛苦起了很大的作用。东北地区历来缺乏医生，“土人无知医者，医多来自内地”。^②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鬼神，认为所有的病最终都要归结到某个鬼神身上。“巫风盛行，家有病者，不知医药之事，辄招巫入室诵经，装束如方相状，以鼓随之，应声跳舞。云病由某祟，飞境驱之，向病身按摩数次遂愈。或延喇嘛治之，亦大同小异”。^③当时东北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盛京，“系统的卫生设施根本不存在，狗和猪都成了食腐动物，死水塘随处可见，难怪在流行病发生的时候，无情的病魔会很快蔓延到整个城市”。^④这些都表明了东北当时环境恶劣、不讲卫生、缺医少药的客观情况。教会医院的医疗水平、医疗条件比较高，医疗效果比较好，到教会医院就诊的人非常多。教会医院在治病救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盛京施医院“1886

^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六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版，第1900页。

^②西清：《黑龙江外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页。

^③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④《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35页。

年记录的门诊人数就有约万人，其中手术 251 例，108 位病人住院治疗”。^①到了 20 世纪初，盛京施医院“每岁诊治约四万余人”。^②盛京女施医院“每岁诊治三万余”。^③不仅如此，教会医院都具有一定的慈善性质，虽然实行收费，但对于贫苦患病者，仍然免费诊治送药。先后设立的女施医院、妇科、产科，为东北妇女的治病带来了方便。

教会开办的医疗事业促进了东北医疗事业的发展。医疗卫生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但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以及政府的重视不够，近代东北医疗事业基础相对落后。就东北而言，由于教会医院创办的时间早、技术水平先进，因此成为东北医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促进了东北医疗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这些医院收归国有。如吉林高大夫医院 1950 年被吉林省卫生厅接管，易名为群众医院；1953 年长春施医院被长春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接收，改名为长春市立医院分院，旋易名长春市妇幼保健院，1955 年易名长春市产院；爱仁医院 1951 年 10 月由沈阳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沈阳市妇婴医院”等。

教会医院及附设的医校，还为东北培养了医务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人在解放后仍然为东北医疗事业作贡献。比如 1953 年长春施医院被长春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接收时，据《移交报告书》记载，全院总员 55 人，其中医务 40 人，职工和工人 15 人。其中医师 3 人，助医 1 人，X 光技师 1 人，化验技士 1 人，护士和助产士 6 人，药剂 3 人，助产练习生 25 人。内置外科、内科、五官科和妇产科。门诊日平均 170 人，住院部病床 63 张；住院分外科和内科。

西医临床诊治手段也日益进步，医学分科进一步细化。19 世纪西医传入东北时，只用听诊器、血压计等检查手段。1914 年 3 月，盛京施医院有了放射线机，影象诊断技术也开始应用于临床。1870 年，英国传教医士白兰德在牛庄开设普济医院，设内、外二科，是东北外科设置的开始。1884 年，司督阁应用“哥罗仿”麻醉，成功进行了肢体离断等手术。同年，司督阁成功地施行了第一例白内障手术。19 世纪 80 年代末期，盛京施医院设立儿科，由外籍医师负责。1912 年，盛京施医院设置眼科。1896 年，盛京施医院附设女施医院的同时，设有妇产。1910 年于女施医院设产科，翌年举办助产速成班，培训旧产婆，推行西法接生。

教会医疗事业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改变东北人民的观念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支配下，中国人往往将外国视为蛮夷之邦，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观念对外是中西之间正常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障碍。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为保存“满族之本习”，防止满族汉化，独占东北的特产，清政府在 1740 年颁布封禁东北的法令，实行封禁政策。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后，为了移民实边，以利饷源，清朝才最后放弃了封禁东北的“国策”。在封禁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个从全面厉禁到禁中有弛的变化，但总体上延缓了东北地区的发展。在思想观念上表现为东北人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时间改变。

日益增多的教会医院、医学院校、护士学校等都是西医文化东渐的重要媒介，它们

^①《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 72 页。

^②《沈阳县志》卷 14《慈善》，第 620 页。

^③《（民国）奉天通志》卷 144，第 3289 页。

使中国人在感性上和理性上接触到了近代西医文化，西方传教士在东北创办的教会医疗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北人民的对外观念。在最初，“他们被怀疑是英国军队的先锋，传出许多挖心、摘眼等等谣言”。^①人们有了病，自然首先找本国的中医治疗，只有当中医无计可施的时候，才转而求助于西医。但教会医院的医生们凭借高超的医术和救人之心得，“取得官厅和人民的信仰，因此，他们的医院反而扩充起来，西方药物渐为一般人所欢迎”。^②医学传教士与东北的地方官员、社会各界关系良好。1907年，盛京施医院重建，“赵次帅及日本大山大将大为赞成，次帅捐助四千两”，“其余中、日、英士绅好施急公者，无不争先助斯善举者约有二万两之谱”。^③盛京施医院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开院典礼，“恭请次帅以下省城大员及日、英、美、德等国总领事以下官绅行竣工典礼”，“下午次帅、各国领事以及中外官绅均衣冠整齐，参列典礼，并有皇寺常印喇嘛带领从人数名前往叩贺”，“二十二日招宴中国教民”，“二十三日柬请省埠华商百五十人公宴”。^④清末东北实行新政改革期间，当时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也曾就新政事宜多次向司督阁咨询。从教会医疗事业中，东北人民认识到了西医以及西方文化的价值。

教会医院设置的目的，不仅是要减少人身体上的痛苦，更是要拯救人的灵魂。所以大多数的医生，在没有到中国之前，都曾经接受过神学的训练。他们相信，每个伤口的包扎，每剂药品的给付，都是上帝之爱的直接宣告。他们的责任，是要向病人宣传福音，使大多数就医的病人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得到一种宗教上的影响。对于一般贫穷的病人，不收医资，不收药费，使他们感觉到教会医院完全是一种慈善事业，对于宗教方面发生了兴趣。医院中“对宗教方面的设施非常注重，一般看护士及职员，大都施以宗教上的训练，特别在每个医院之中，有专聘的传道人员或牧师，担任向病人讲道及分发布道传单等工作”。^⑤因此，教会医疗事业的传教活动也使不少人在特殊情况下皈依了基督教。比如著名的传教医生司大夫藉行医以传教。他以外科手术闻名遐迩，被称为“奉天圣者”，经他医治的病人而信教的颇多。一位叫常森的盲人接受司大夫的医疗以后，便回乡到处传扬基督教，据称曾劝化约2000人归信了基督教。^⑥这也是教会医疗事业对于近代东北观念变化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

（二）社会救济事业

教会的社会救济事业主要是由教会医院来施行。教会医院除了日常的诊病工作外，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救助工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盛京施医院收容很多伤兵。1888年，辽阳城遭受太子河特大洪水，在此传教的吴阿礼大夫雇用小船载运食物、药品等到灾区放赈、治病。^⑦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盛京施医院一面收容伤兵，一面救治难民，受益难民人数达35000人。1910年末，严重的鼠疫在北满流行，哈尔滨一带死

^①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90页。

^②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90页。

^③ 《民胞物与人被欢颜》，《盛京时报》，1907年3月6日。

^④ 《施医院开院内志》，《盛京时报》，1907年3月10日。

^⑤ 《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88页。

^⑥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04—305页。

^⑦ 辽阳市政协编：《辽阳文史资料》，第五辑，1990年版，第127页。

亡惨重，瘟疫沿铁路蔓延，大有波及关内之势。清廷电令东三省总督锡良组织防疫，派天津陆军医学堂会办伍连德博士为全权总医官。北京设立京师防疫局，东北设东三省防疫总局。锡良邀请司督阁协助防疫工作，任命他为防疫总指挥。盛京施医院有三名英国医师参加防疫工作，司都阁负防疫总责，袁阿氏照顾医院工作，嘉克森负责皇姑屯车站防疫检查工作。他们在这场防疫战中为扑灭鼠疫作出了贡献，嘉克森还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①这些社会救助活动是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的延伸和扩展，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三）提倡新式教育

教会学校不仅传播宗教教义与教理，还教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并且注重实用人才的培养。教会学校内容除了宗教神学课程以外，一般都设有西学课程，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样的课程设置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四书五经之外的广阔天地，并激起他们探求新知识的强烈愿望。在近代中国动荡不安、教育事业难以发展的状况下，教会学校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师资，培养出了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教会学校将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育体制引进中国东北。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教育对象看，传教士认为每个人均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比中国传统教育，即只注重培养少数男性优秀分子入仕更具先进性，更接近近代教育中的国民教育。教会对于平民教育非常重视，各教会普遍开设“主日学”，“教会的教友60%的男子、40%的女子都能读《圣经》，其识字的百分比高于其他人群”。^②

第二，在教育内容方面，中国的封建教育只培养文学与政治人才，是一种单纯的通才教育。教育内容以文字材料为主，内容不外经、史、子、集等，完全忽视专才和职业教育，教育与现实生产完全脱离。东北教会学校开设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开办专门学院培养翻译、外语、法律、医学和工程技术等专门人才，实现教育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相结合。当时东北教会学校的毕业生，除了从事宗教事业外，更多的从事文教、医务、机关等方面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东北教育的不足。比如当时奉天文会书院的毕业生可以从事牧师、教员以及自选的职业，也可以去英、美留学；奉天医科大学培养了大量的医学人才；海城三育中学的学生以能学会英语会话、翻译简单信件和阅读英文报刊为结业标准，并且结业后由教会负责推荐职业等。

第三，就教育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教育偏重道德教育；而教会学校则是近代意义上的全面教育，即一定程度上的德、智、体、美四育。比如奉天警文重明女学校鼓励学生参加劳动，按学生成绩优劣和工作勤惰，给以少许酬金；锦州育贤小学曾设置体操、音乐、图画课程等。

第四，以教学方法而论，教会学校基本上采用了一套近代教育方法，实行分科、分班和分级教学。比如锦州育贤小学分高等和初等两个班，高小班课程有修身、国文、英文、算术、体操、音乐、图画等，初小班不设英文，其它课程和高等班相同；奉天警文重明女学校课程设置曾有摸字、国语、算术、常识、自然、历史、音乐、体育、英语、日语、缝纫、编织、烹饪等14科，设幼稚班（初学摸字者）、初小、初中三级等。教会

^①《辽宁省志·宗教志》，第223页。

^②《中国基督教史纲》，第330页。

学校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采用实验方法。而传统中国教育以教师输入为主，讲解和背诵是基本方法，忽视思维训练。

新式教育的另一内容，是女子教育。教会女子学校的建立，冲破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为东北妇女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能够学习新学问、接受新事物。教会女校的毕业生不仅学习到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在道德上得到提高。东北教会医院设立的产科学堂，使女性学习到了西医知识，开创了近代女性的职业教育。女子护理、助产等教育的开创，使妇女可以进入学校并与男子一样平等的接受近代科学教育，同时使妇女获得了谋生的技能。虽然毕业生就业领域狭窄，有机会谋生的人也在少数，但她们自立于社会，不需要男人而独立生存，体现了自信、自由的女性新形象。妇女在医界工作，与男人共事，使妇女的潜能得到发掘，对男女大防的旧习俗是一种挑战，从而推动了东北妇女观念的变化，对近代妇女解放有着积极的意义。

教会女子学校对于废除封建陋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起初，教会女子学校对妇女缠足并没有什么要求。后来，教会女子学校“添设体操课，要这些小脚的姑娘在操场上站一点钟，这简直是刑罚，这样使她们自对缠足厌恶。后来教士们又有天足会的组织，提倡不缠足运动，许多女塾都跟着规定，缠足的姑娘不收。于是要进学堂的教外姑娘，也有不缠足的了”。^①显而易见，教会女子教育的发展，对废除妇女缠足的陋习，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为了稳定学校的秩序，教会女子学校在学生入学时要其家长填一志愿书，以保证学生未达学有所长时决不半途辍学。中国各地盛行早婚，由于教会女子学校这番规定，在抵制早婚陋习方面也收到了有限的但却是积极的成效。

三、清末洋教传入东北的消极作用

中国人从来不排斥外来宗教，洋教传入我国已有数百年历史。应当说，在洋教的众多传教士中，不乏虔诚、正直、以传播上帝福音为宗旨的人士。随着他们的到来，西方的一些新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对我国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传教士是作为列强的侵略势力而来到中国的。这部分传教士倚仗传教特权势力在中国作威作福，滋生事端，辱殴官员，枪杀人命，干涉地方事务。教会为扩大其势力，吸引更多的人入教，对教徒极力庇护。“查近来教民之多，几于无处蔑有。其中有被洋人利诱甘心入教者，有为官绅威逼借教为护符者”。^②在遇到民教纠纷时，地方官员不敢开罪洋教士而作出有利于天主教教徒的判决。一些人为了能够打赢官司而匆匆入教。一些恶徒混迹在教友之中，他们横行不法，而传教士却一味包庇。因而民教冲突不断。“光绪年间（1875—1908年），教士庇护信徒，代理词讼，奸民投身其间，依为护符，往往借其势力，欺凌良善，遂引起人民仇教思想”。^③与洋教传入的积极作用相比，其消极作用同样明显。

^① 褚季能：《女学先声》，《东方杂志》卷31，1934年第7号，第25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

^③ 《（民国）奉天通志》卷99，第2273页。

（一）庚子教案赔款

庚子赔款，实际上应分为两项。一项是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签定的人赔款，即名义上的庚子赔款；一项是各省签定的地方赔款。其中大赔款初定海关银 4.5 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分 39 年还清。加上息 4 厘，本息共计约海关银 98223 万余两。这个数字是签约时初步订的，并不是实际偿还款数，在赔款期间由于缓付、停付等原因，中国总偿付数要小于原拟定数。据《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的“历年支付庚子赔款总额表”可知，中国实际偿付大赔款额约为 652377987.75 海关两。^①而至于地方赔款总额，由于统计比较困难，现难以精确计算，初步预计为 2270 余万两。

东北的庚子教案地方赔款分天主教和基督教两个教派，主要是各国的领事、传教士以及教民与东北地方政府调查协商所议定的赔款。

在北京辛丑（1901 年）谈判之际，天主教南满教区提出了举行地方谈判要求。1901 年 6 月 10 日，南满教区代权苏斐理（法）神甫致书盛京将军增祺，要求赔款 750 万两白银。总理衙门指示增祺，“教士索赔数目，核之地方官查报情形，设法琢磨。”等《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再“自行商办事结”。但是，南满教区主教迫不及待，向盛京将军署“先借银 4 万两”。《辛丑条约》签字后，增祺派候补道彭英甲、徐镜第等 4 人到北京，与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天主教南满教区代权苏斐理进行谈判。1901 年 12 月 27 日签订《奉天全省天主教案约章》九条。主要内容是赔偿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命案、教会损失和信徒房产。规定“天主教堂被毁由大赔款内办结教民恤款一百四十万两”，“奉天天主教外国传教士人命挖坟修坟一切大小事体一律完结共赔款奉天沈阳平银四万两整”，“惟戕害主教纪隆实可惨恨，拟将沈阳教堂东隔壁民地一段，共二亩多地，由将军发官价买交教堂作为纪隆纪念祠堂”，“至被挖外国传教士坟地五座须仿照山西办法，立碑五座，每碑带亭，一千银之数为度，五角碑共银五千两”。^②

南满教区订立《约章》后一个月，北满教区主教蓝禄业，于 1902 年 1 月 29 日致函吉林将军长顺，要求吉林赔款 34.57 万两白银。吉林将军委派吉林副都统成勋、宁古塔副都统庆禄、吉林分巡道文韞、协领富荫等 4 人为谈判代表，同时通知发生教案地方进行调查，经过“磋商几十次”，1902 年 10 月 19 日达成协议，1903 年 1 月 20 日订立《吉林天主教案合同》五条，规定“筹结吉市钱五十四万吊（约合白银 18 万两）”，“将吉林各处教堂房间及堂内圣物器皿等项，并恤抚教民孤苦，以及教民被焚房屋、财物一切包括在内”。赔款分四次付清，“除前次交收市钱八万吊另有房契九千七百吊外，净剩四十五吊另三百，于立合同签押之日交一十四万吊另三百；二十九年六月内交十一万吊；二十九年十二月内交十万吊；三十年六月内交十万吊”。^③

关于黑龙江境内的赔款，据《清实录》记载：“光绪三十年四月乙亥署黑龙江将军

^①对外贸易部海关管理局研究室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228 页。

^②《开原县志》卷 9《外侨事略》，第 871—872 页。

^③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28 页。

萨保等奏：江省偿恤教案，由俸饷垫给银十七万六千两，恳饬筹拨，俾资弥补”。^①

在黑水丛书《程德全守江奏稿》中有下列陈述：“窃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曾因江省议赔款教案十二万两……又于二十九年八月初二日将议结江省被害三教士挖坟二处恤偿银四万五千两……先后偿恤教款核计银十六万五千两，加以办理教案经费解送款项川资暨道胜银行息利等项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两，共银十七万六千九百六十两”。^②两处对照可以知道，黑龙江将军管辖的地区，赔款十六万五千两，关于因赔款而向银行借款的利息不应该算在赔款统计之列。

以上总计天主教东北地方庚子赔款共 179 万两。

中法天主教教案谈判结束后，1902 年 5 月 23 日，中法双方又签订了《奉天全省耶稣教案约章》十二条，规定“除焚毁各处教堂归大赔款另办外，统计议定由官筹给沈平银五十七万两整作为抚恤孤苦并赔偿教民所失之田房、财产、牲畜、车辆、器具、树株、货物以及捐罚银钱等项，分限三年赔清”，并且“教民妻女有被匪徒霸占者由教堂牧师函知地方官查明追回”，“教民房田并当红契文约有查入抄官及被匪霸占者由教堂开单报官，迅速查明分别追还，有失落房田税契等类文约邀同地保中证即原卖主公同报明另立新契”等。^③

1903 年 1 月 30 日，吉林将军代表吉林分巡道文韞、吉林交涉局富荫，与基督教关东长老会会正劳旦理签订《吉林耶稣教案合同》八条。规定“筹给吉市钱二十七万吊（合白银 9 万两）”，“将吉林各处教民被焚、被失房院财物一并包括在内”，“于立合同签押之日，付钱一十三万五千吊。迨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付钱一十三万五千吊……由教士分给教民承领”，“教民被戕情事，拟就表扬碑文，在敦化县、朝阳山两处，建立石碑各一通。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节前立妥”。^④

以上共计基督教东北地方庚子赔款共 66 万两。

除此之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记载：“美国驻京教士贺庆、山海关教士向雅各、中国教士德瑞等来函。以州属中前所、前屯卫两处，各有租赁民房耶稣教堂一所。庚子拳匪之乱，中前所教堂、前屯卫教堂与该两处教民财物同被毁失，计值不下十万吊，应议赔偿卹……其地现虽改归新设绥中县管辖，其案则在未经设县以前，仍应在宁辽州会同议办等情……议定由官筹给东钱五万吊，为教民卹款，以二千五百吊为教堂赔修之款，通共东钱五万二千五百吊，合宁辽市平银七千五百两，并与该教士等合拟完结章程六条，为日后民教永远和睦之计”。^⑤这里提到的是关于奉天省宁远州前卫所、前屯卫美国美以美会基督教的赔偿情况，教民赔偿和教堂修理共计白银 7500 两。

以上是笔者能够收集到的关于东北庚子地方教案赔款的情况，天主教和基督教两个教派取得了共计 245.75 万两的赔款。

东北地方庚子（1900 年）赔款，是帝国主义传教士们联合起来，对中国地方官署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白银掠夺。这其中除了对教堂、教民的赔偿外，还包括各种定额外的赔偿。比如奉天天主教教案赔款中，除了赔款教民白银 140 万两外，还包括“为被害教士贞

^①李兴盛、张杰编：《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钞》（同治四年至宣统三年），下编，哈尔滨：内部出版，1984 年版，第 518 页。

^②李兴盛、马秀娟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2 页。

^③《开原县志》卷 9《外侨事略》，第 873—876 页。

^④《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 429 页。

^⑤《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第 5023 页。

女建堂，共建七堂，需银十三万一千两，教士坟墓一处赔 5000 两，妇女被迫改嫁者，除退回外，每名罚银 50 两。又立碑五座，每座付银 1000 两”。^①为建主教纪隆纪念祠堂，“由官代买教堂附近民地二亩余，内房屋四十间，索银五千两”。^②

东北地方政府为了支付赔款，不外乎两种方式：“一为民付，以摊派方式筹足付赔；一为官付，由司库挪用他款支付。官款亦向百姓搜刮而来，最后仍不外加重百姓的负担，不过方式稍异，或时间稍迟而已”。^③加上当时东北全境正处于俄国的占领之下，局部地域抗俄战争正在进行，造成的损失巨大。比如吉林库存数十万白银被俄国军队抢走，吉林造币厂被俄国军队洗劫一空。吉林将军长顺称：“兵燹之后，公私竭蹶，商民交困，实无此财力可以交付”。^④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称：“自遭兵燹，遍地哀鸿，艰难困苦”。^⑤为支付赔款，奉天省“由东流各围荒局招徕承租地，得银二十万两，西流围荒大臣提借十万两，部库借二十五万两，由各局处搜索及商品通融，凑足余款，大部分皆由司库支付”。^⑥

对于筹措“民款”，则“先查封实际参加抢杀拳民房地，变价卖抵，不敷，则令习拳之家，罚捐完纳，仍不足，则摊派富户、粮户。一般而言，拳民大半无业游民，从而习之者又多无赖习弟，由此两处筹措，实不足以应付赔款，非向良民摊捐不可。摊派的方法，或按亩捐数，或按人摊捐”。^⑦如 1902 年—1904 年的三年间，吉林将军署从“九厘新捐”项下所收之款付给天主教。

各种各样的筹款方式严重影响到了东北人民的生活，使本已疲惫不堪的劳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东北地方官吏为筹集此款，搜肠刮肚，乱立新税捐项目。各种筹款方式的开办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使本以十分凋敝的东北经济遭到进一步的打击。除了各种筹办官项外，东北各地方官吏多方勒索，私自提款之事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官员采取一味妥协的态度，东北地方官府的筹集赔款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地方赔款使得百姓“既受拳祸于前，复受教民欺压于后，心颇不甘，因之抗捐之事甚多”^⑧，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此种反抗态度并非以教民为主要对象，而是以官吏为主要目标，各地抗税抗捐斗争不断出现，进一步瓦解了清朝在东北的统治，为东北的变革积聚了力量。

（二）霸占田产，强取豪夺

1882 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司铎贡罗斯在呼兰利用教徒，置买租户窦玉、侯希春、傅永太等盗卖业主郭定恒、于财等地基三段，欲修教堂。郭定恒等业主执其“红照”，“控于旗署”。经询问证实，按律科罪，“断归原主抽贖”。但贡教士不允，以倘误教堂期即缴龙票（龙票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给许传教之执照）相要挟。“副都统博栋阿老而病被逼无计，领催富森等不平诣教士理论。贡教士握枪出见，误毙领催来仓，旋返巴彦苏苏，以旗兵滋事达之驻京法使”。法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赔偿损失器具银三千两并派驻津总领事狄隆赴江查办”。最后的审理结果，“领催富森布枷号六十日，甲

^①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348 页。

^② 《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第 349 页。

^③ 《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第 357 页。

^④ 《吉林省宗教志》，第 245 页。

^⑤ 《吉林省宗教志》，第 245 页。

^⑥ 《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第 358 页。

^⑦ 《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第 358 页。

^⑧ 《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庚子拳乱》，第 360 页。

兵依凌山等九人笞四十鞭，责发落窦玉等盗卖有主之产杖八十，枷号两月，追出卖价给还教堂，收领地归原主郭定恒等价抽赎，贡教士枪伤来仓身死应由该国照约办理”，并且赔偿该教士白银 3000 两了事。^①

教堂还以威胁讹诈等方式，掠夺中国农民土地，然后再把土地租给农民，进行封建剥削。他们还用高利贷对农民进行盘剥，在当时的朝阳一带，据调查教堂向农民放高利贷有三种形式：一是借地作保，即在契约上限定还款日期，如到期不还，便将地没收，这被称为“老虎牌子”；二是坐地留利，即借款时先扣下一年的利息，再将余款贷给农民；三是“驴打滚”，即借钱到期还不上时，便将利息归本，利上加利。教堂除了放钱外，还放粮食，利息之高竟有春借一斗秋还五斗者。^②

（三）欺压官民，包揽词讼

1876 年二月，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官兵夜巡与教民口角一事，给巴彦苏苏委协领那斯琿的一份扎文中称：“天主堂，近年以来，凡遇地方事件，勿论大小，频向干预；更兼奸民犯事，即规求入教，觊觎袒护”。^③

教士不仅干预地方事务，还干预地方司法。1898 年，农安县小八家子屯教堂失盗，本堂神甫古若瑟派人抓信徒马、李、尹 3 人，诬指为盗。私设公堂，吊起来拷打、压杠子逼供，折磨的死去活来，然后押送到长春府大牢。三个月后案破，与 3 人无关。释放 3 人回村后，古弱瑟神甫派人将该 3 户驱逐出村。^④

巴彦苏苏天主教堂，“原系民人韩振清承领地基，于同治十二年间转卖与天主堂。自修堂后，改称天竺堂之地，声言不纳地基之租”，该教堂教民司铎讷依文称：“该国各省传教凡有修堂、屋、公所应用之地，大小官租，概不应纳，由来久矣”。不仅教堂不纳租税，该教堂司铎还唆使教民刘士清抗税，并且要求释放因“漏税抗不交纳”而被差役逮捕的教民刘士清。“教民如有不纳，本司铎自有责民之法，亦不应凌辱不堪。欺暗异国，实属不合；而刘士清，并无别罪，不准将其曲折，即刻释放”。^⑤当呼兰理事同知托蒙阿追问其“修堂设屋之地不准纳大、小官租之和约，有何凭证”时，该教堂司铎讷依则声言：“本司铎入境各有明文，何应追凭逼据，况而行同木偶，勉强多事，屡次将本司铎此等藐视，实属不晓事体，胆敢勒租征税，追逼何凭”。^⑥最后托蒙阿发出感慨：“若任其肆意横行，第恐日久，犬豕之性得步幸步，不识中华规法，同知理论，即已蚕食渔利，复欲虎视官长，其志无厌，将不知何所地止”。^⑦

传教士甚至对清朝高级官员也随意侮辱。1878 年 8 月 17 日，呼兰民人萧信持天主教士讷依而然名片，告知呼兰城守惠安，言称该教士即日进城。惠安即派官人迎接。由于迎接的官兵不知从何道而来，未能相遇。该教士怒气冲冲，竟率人闯入衙署。“其中

^①《呼兰府志》卷 5《外交略》，《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年影印本，第 454—455 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 47—48 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元年—七年），第 94 页。

^④《吉林省志·宗教志》，第 246 页。

^⑤《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元年—七年），第 48 页。

^⑥《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元年—七年），第 49 页。

^⑦《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元年—七年），第 49 页。

一人踢坏重门，手执马鞭直至卧房门首，其余接踵进入内院……惠安听闻吵嚷之声，急由屋内出来，见有洋人，随用好言开导。不容分说，该教士骑在马上，手持洋枪，下令跟役、华民王忠义等，在马上即用马鞭向城守尉殴打，并有数人下马动手，将城守尉顶心偏左等处，殴打皮破、红肿多伤，并将所穿衣服滥行扯坏，惠安被打头迷眼昏”。^①但该教士却反咬一口，慌称自己遭到殴打。惠安被殴打后，于九月十四日调到巴彦苏苏“调养”，“只言夷人欺官太甚”，“迨至次日，更见气忿，忽迷忽醒，头昏倒地；迨经苏醒，坐卧不安，出外乱走，不意走落该店井内”。虽然救出，但“形状痴呆、不能言语”。十月初三日夜，又“心神恍惚，信步乱走，不知去向”。^②待开江后，发现尸体，才知道是投江溺死。一个传教士如此对待三品官阶的清朝官员，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①《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元年一七年），第 233—234 页。

^②《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元年一七年），第 237—238 页。

参考文献

- [1]李刚己:《教务纪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 [2]李杓:《拳祸记》[M].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9年版.
- [3][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M].大连:满铁社员会,1940年版.
- [4][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 [5]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M]:第一、二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7]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 [8]施督阁:《奉天三十年》[M].矢内原忠雄译.《矢内原忠雄全集》第23卷.东京:岩波书店,1942年版.
- [9]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0]必克:《支那教案论》[M].严复译.上海:南洋中学译书院,1899年版.
- [11]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合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12][英]伊泽·英格利斯著:《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M].张士尊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 [13]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
- [14]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 [15]朝鲜族简史编纂组:《朝鲜族简史》[M].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16]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 [17]韩俊光:《朝鲜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 [18]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 [19]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20]李兴盛、马秀娟编:《程德全守江奏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21]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 [22]吉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23]黑龙江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宗教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24]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辽宁省志·宗教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吉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吉林省志·教育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25]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教育志》[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
- [26]西清:《黑龙江外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27]徐宗亮:《黑龙江述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28]《安东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
- [29]《开原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

- [30]《沈阳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
- [31]《桦川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
- [32]《呼兰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东北部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
- [33]王树楠等编:《(民国)奉天通志》[M].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委会,1983年影印本.
- [34]王铁崖编:《中外约章汇编》[G].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
- [35]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G].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 [36]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G].第三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 [37]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电牍)》[G].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 [38]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G].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 [39]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G]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 [40]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G]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 [41]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G].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42]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一〇—一九二〇)》[G].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43]朱有瓛,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G]: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44]《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抄》[G].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
- [4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G]:第六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版.
- [46]对外贸易部海关管理局研究室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G].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 [47]李兴盛,张杰编:《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抄》[G]下编,1984年,内部出版.
- [48]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G].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49]政协锦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锦州文史资料》[G]:第九辑,1990年版.
- [50]政协辽宁省海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海城文史资料》[G]:第三辑,1988年版.
- [51]新民县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印:《新民文史资料》[G]:第三辑,1990年版.
- [52]政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员会学习文卫办公室编印:《凌河文史资料》[G]:第一辑,1989年版.
- [53]辽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阳文史资料》[G]:第一辑,1985年版.
- [54]政协沈阳市大东区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大东文史资料》[G]:第五辑,1991年版.
- [55]辽阳市政协编:《辽阳文史资料》[G]:第五辑,1990年版.
- [56]《万国公报》[N].1904第8期.
- [57]《民胞物与大被欢颜》.《盛京时报》[N].1907年3月6日.
- [58]《施疗院开院再志》.《盛京时报》[N].1907年3月10日.
- [59]褚季能:《女学先声》,《东方杂志》[N].1934年第7号.
- [60]吴文衍:《营口开港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东北》.《学习与探索》[J],1984年第2期.

后 记

时光飞逝，回首三年，2004年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有幸承蒙王景泽教授的指导。在这三年中，从熟悉史料和名家著作，到培养透过史料寻找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每一段过程都经过了先生悉心安排和指导。

本文从选题、构思、资料搜集、论文写作到最后定稿自始至终得到了导师的全力帮助。在此，我向我的导师王景泽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在开题报告过程中，我得到了罗冬阳教授、董铁松教授、赵玉田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他们的指点和启发，使我受益良多。在对资料的收集过程中，我要感谢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的杨曼老师，期刊室的孙丽华老师，图书馆古籍部的刘奉文老师和苏铁戈老师为我提供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在三年学习生活中对我的支持。

由于本人学识浅薄，能力有限，加上时间较为仓促，因此文章中一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先生，各位同学批评指正。